

孙晓春



商朝的建立者

商 汤

商

汤，在商人的后裔所传唱的诗歌中被称为武汤、天乙、成汤、武王，在甲骨刻辞中又作大乙、高祖乙。商王朝的创始人。商人及其后裔在祀祖时，经常追诵汤的功德，赞美他的业绩，孔子则把他与夏禹、周文王、周武王并称为“三代之英”，可见，在历史上商汤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商人原是活动于黄河下游地区的一个部落，根据历史传说，大约在汤的十四世祖契（xiè音谢）的时候，商人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以后，商部落内部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在汤的七世祖王亥的时候，开始用牛作负重的工具，在各部落之间进行贸易。在王亥子上甲微做部落首领时，消灭了北方的一个强大的部落有易氏。随着经济的发展，部落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到汤即位的时候，商人已经迈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当时中国的中心地区，即今天的豫北晋南一带，是夏王朝直接控制的区域。这里依山傍水，形势险要，河洛之间地势平坦，物产丰饶。依据这些有利条件，夏人较早地完成了由部落向国家的转化过程，依靠武力控制着周围的被征服部落，这些部落向夏王朝称臣、纳贡，汤所在的商部落也是如此。

但是，在汤即位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经过上甲微以来几代人的努力，商部落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具有了与夏王朝抗衡的实力。同时，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由于部落内部的阶级分化，商人由部落向国家的转化也已经基本完成，夏商之间在文明程度上的距离明显缩小了。另一方面，夏王朝的统治正江河日下，以夏王桀为首的奴隶主贵族

骄奢淫逸到了极点，残贼海内，赋敛无度，对夏民和所属部落实行残酷的奴役和压榨，引起了夏民和各部落普遍的不满。夏商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预示着夏商之间的从属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各部落的统治权力最终将发生改变。灭夏的条件在汤即位以后逐渐成熟起来。

第一，亳都的建立。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载，从契到汤十四世之间，商部落共八次迁都，这八次迁徙的详细情况至今已经不可得知，但至少可以说明，商人在成汤以前的社会生活是不固定的。汤即位后，在亳（**bó**音薄，今河南商丘县北）建立都城，标志着商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亳都的建立，对于商部落定居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据说，汤曾经派人帮助葛部落耕田，说明在汤定都亳之后，商人的农业生产在东方各部落中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第二，选用贤才，整饬内政。当时，有一个部落叫有莘氏，与商人通婚。有莘氏嫁女于汤，用一个名叫伊尹的奴隶陪嫁，伊尹到了商部落以后，负着鼎、俎（古代的两种炊具），借喻于烹调滋味与汤谈论王道，汤发现了伊尹的政治才能，便擢他为右相。之后，又从另一个部落选用了—个名叫仲虺（**huī**音灰）的人为左相，把部落内部的事务交给他们处理。

选拔伊尹、仲虺的举动，表现了汤的敢于改革部落制度的勇气。在远古的部落制度下，部落公职人员的选拔范围，不能超出部落界限，而被汤选用的伊尹、仲虺都不是本部落的人，表明汤已经不同于原始时代的部落首领，古老的部落界限正在被冲破。

事实证明，汤在用人方面是成功的。伊尹、仲虺都是十分难得的人才，特别是伊尹，在商灭夏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许多谋策

都是由他制定的，而且，在灭夏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伊尹对于商王朝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载，汤的长孙太甲即位后，政治昏暗，暴虐乱德，一度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伊尹便把太甲流放到桐宫（今河南虞城东北），自己代理国政，在太甲改过之后，伊尹又还政于太甲，商王朝的政治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正象后人所赞诵的那样：“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意思是说阿衡（即伊尹）辅佐了商王。商灭夏的成功和商朝初年的政治稳定，是与汤任人唯贤的举措分不开的。

第三，反夏联盟的形成。从汤即位起，商部落进入了向外扩张的时期，在伊尹的谋划下，商汤开始了一系列的与夏王朝争夺与国的活动。

汤争取与国的活动，一方面是通过宣传自己的“仁德”，对周围的部落施加影响。《史记·殷本纪》记载了汤这样一件事：一次，汤外出，看见有人在野外四面张网捕鸟，张网的人说：“但愿天下四方的鸟都飞入我的网内”。汤听见之后说：“这太过分了”。便让人把网撤去三面，留其一面，张网的人只好说：“愿意向左飞的鸟就向左飞，愿意向右飞的就向右飞，时运不好的鸟就飞到我的网里”。这件事虽小，但在那时，人们往往通过这样的事情来评论一个人的贤否。当这件事传到其他部落之后，人们都说：“汤的仁德，能及于禽兽。”这对汤争取与国的活动起了良好的作用。

汤争取与国的另一种办法是与其他部落通婚和选用外部落的人到商部落任职。通过这一途径，许多部落与商人结成了联盟，如，仲虺所在的部落，原是夏的盟国，仲虺的祖先奚仲曾做过夏的车正，汤选用仲虺为左相，实际上已将这个部落从夏王朝的联盟中争取过来。这样，黄河下游的诸部落大都摆脱了夏王朝的控制。

制，以商人为核心形成了强大的反夏联盟。

反夏联盟初步形成后，汤便着手巩固其根据地的建设，清除夏王朝在亳都附近的盟国。当时，在今天的河南宁陵一带有一个叫葛的部落，是夏的同盟。葛的首领葛伯十分贪暴，不祭祀神明和自己的祖先。在当时，祭祀是部落的头等大事，不祀是最大的失政。汤便以此为理由对葛的事务进行干预。但是，如果仅仅因为“葛伯不祀”就兴兵征伐，势必损害汤在各部落中的威望。于是，汤派人到葛询问他们为什么不祀，葛伯回答说：“我们没有用来祭祀的牛羊，”汤立即派人送去了牛羊。可是这些牛羊并没有被用于祀祖反而却成了葛伯的菜肴。汤又派人去问葛伯：“为什么还不祭祀祖先呢？”葛伯又以没有粮食为托辞。汤又一次容忍了葛伯的无礼，从自己的部落中派一些青壮年去帮助葛人耕种土地，又派一些老人和儿童到田里送饭。对于汤的援助，葛伯不仅不感恩戴德，反而却率领葛人拦路抢劫饭食，杀戮送饭的老人和儿童。讨伐葛的时机成熟了，汤派出军队征服了葛。

对于葛的征服，扫除了夏王朝在东方的一个重要据点，商人有效地控制了黄河下游的广大地区，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对此，《吕氏春秋·具备》说：汤曾经“约于郟、薄”，薄，即亳。郟，古人读如衣，即殷，泛指黄河下游的古兖州一带，即今冀、鲁、豫的交界地区。稳固的根据地，是汤灭夏的物质基础，如同战国时人们所说的那样，汤如果没有郟，就和周武王没有岐（今陕西岐山周原）一样，既使贤才毕至，也不可能取得灭夏的胜利。

征服了葛之后，汤又先后十余次征伐夏的属国，逐一翦除夏的羽翼，据传，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这时，以夏王桀为首的夏统治集团正沉湎于酒色之中，既无力也无心顾及他的东方

盟国，更没有办法遏止商人的崛起。在商人的强大攻势下，夏王朝在东方的屏障韦（今河南滑县东）、顾（今山东范县）、昆吾（今河南滑县东）都先后被征服了，夏王朝暴露在商部落及其联盟的面前。

在伊尹的谋划下，汤开始向夏桀直接挑战，停止对夏王朝的纳贡，果然，夏王桀被激怒了，他调动东方九夷的军队，企图前后夹攻商部落。形势对汤极为不利。

九夷人帮助夏桀，是汤始料不及的。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汤又向夏桀称臣，交纳贡物，夏王桀见物心喜，便草草收兵，夏商之间的激烈冲突暂时告一段落。乘此时机，汤一面积蓄力量，准备灭夏，一面与东方的九夷人通好，瓦解了夏与九夷人的联盟。第二年，汤又停止了对夏的纳贡，这一次，更激怒了夏王桀。为解燃眉之急，夏桀召集他的属国在有仍（今山东济宁）会盟，企图驱使这些部落与商人决战。可是，夏王桀所依赖的九夷之师却没有应召，夷人中的有缙氏带头反叛，于是，爆发了夏王朝与有缙氏的战争。

与商人决战的愿望没有实现，却挑起了征伐盟国的战争。这场战争，使夏的盟国进一步看清了桀的无道，人们愤怒地咒骂道：“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能落山，我们宁愿和你一起死去。”频繁的对外战争，也扰乱了夏民的正常生活，沉重的兵役、力役，使夏王桀失去了夏民的支持，最终成了孤家寡人。

灭夏的时机成熟了，商汤率领大军向夏王桀发起了总攻，两军在鸣条（今河南封丘东）展开了决战。

鸣条之战，是商灭夏的决定性战役。双方都投入了最大的兵力，决战前夕，为了鼓舞士气，汤在军前发布了动员令。这篇动员令，在《尚书》中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商汤说：“不是我大胆

地发动战争，是因为夏王桀犯了许多罪行，上天命令我前往讨伐他”，然后，汤又列举了夏王桀的罪恶：其一，夏桀连年穷兵黩武，使人们没有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其二，夏王桀荒淫无道，向人民摊派沉重的赋役，民力已被用竭了。”这是所有被夏桀奴役的部落的共同语言，在全军上下引起了共鸣。战争的结果如人们所料定的那样，众叛亲离的夏王桀被商汤的军队打得惨败，向南方狼狈逃去，最后死在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商汤则乘胜前进，攻灭了夏的属国三朮（今山东定陶东北），掠取了当地的宝玉。随后，又挥师西上，进至夏王朝的腹心地区。

灭夏之后，汤实行了一系列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

迁都有夏之墟。商人在灭夏以后，取代了夏王朝对中原地区各个部落的统治权。为了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迅速接受和发展夏人的先进文化，汤决定迁都西亳。今天，这座东西一千二百米、南北一千七百米的古城已经在河南偃师发掘出来。这座古城的发现，表明在成汤时期，商人的物质文明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迁都西亳之后，原来僻处东方的商部落进入了中原地区，直接继承了黄河流域的先进文化。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黄河流域的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这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是与汤所开创的事业分不开的。

实行内外服制。据史书所载，在夏王朝统治时期有“诸侯万国”，这些部落在事实上都是“自然长成的结构”。夏王朝虽然享有对这些部落的统治权，但相互间仅仅是松散的联盟。商王朝建立之后，汤为了加强对这些方国部落的控制，明确规定：王畿以内为内服，由商王室直接控制，王畿以外的诸部落为外服，依其住地距王畿的远近，依次分为侯服、甸服、男服、卫服，由各方国部落的首领实行自治，服事于商王，对王室承担贡纳等义

务。内外服制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专制王权，使黄河流域的各个部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这对于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的华夏族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商汤灭夏之后，由于持续不断的扩张，使商王朝的疆域较之夏代更为辽阔，《诗经·商颂·殷武》说：在成汤的时候，远方的羌人、氐人，没有不来进贡的，没有不称臣的。从考古发现来看，商朝的统治区域已经掩有今天的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山西、陕西、安徽、湖北的大部，中原的先进文化，随着商王朝的扩张，传播到边远的地区，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各个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



· 孙晓春 ·



为振兴商朝而迁都的

盘 庚

盘庚，是汤的九世孙。在商代历史上，盘庚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国王。他在位期间，把国都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平息了商王朝历时几代的政治动乱，从此，商代进入了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

在盘庚即位的时候，商王朝正面临着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动乱的根源集中地表现在对于王位继承权的争夺。

商王朝建立以后，商人最终完成了由部落形态向国家的转化，最初的父系氏族公社的各级家族长，演变为奴隶制国家机器的各个环节。但是，作为初期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在许多方面仍然保留着氏族公社的遗迹，特别是文明时代的王位继承制度还没有固定下来。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来看，这期间的王位继承基本是兄终弟及的，直到幼弟死后，才由下一代人继承。可是，王位在两代人之间应该怎样传递，商王朝没有严格的规定，这就促使同一代诸王的子孙都有践登王位的欲望，王位纷争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从仲丁到阳甲九个国王之间，商王朝基本上是在激烈的王位争夺中度过的，史称这一时期为“九世之乱”。在盘庚的曾祖父祖乙死后，王位先是传给长子祖辛，祖辛死后，传位于其弟沃甲，沃甲死后，根据习惯应该传王位于他的儿子南庚。可是，不知什么原因，继承王位的却是祖辛的儿子祖丁，祖丁之后，王位继承权又转到南庚手中。从《史记》的记载来看，这一阶段诸王的在位时间都不很长，而且祖丁和南庚之间的王位相互传递是很不正常的现象。阳甲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弟弟盘庚，标志着两个家支中的力量均衡被打破了，但是，矛盾和动乱也在酝

酿之中。

王位纷争，极大地影响了商人的社会生活。每当这种纷争激烈的时候，在位的国王便往往以迁都为手段削弱敌对集团的力量，以求得暂时的安定。仲丁的时候，把国都由西亳（今河南偃师）迁到隰（今河南荥阳东北），河亶甲即王位以后，又把国都迁到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邢（今河南温县东），南庚又由邢迁于奄（今山东曲阜）。至此，商人离开了已经习惯于居住的河洛平原，从华夏的中心地区迁到了偏远的东方。国都迁徙无常，受害最深的是社会下层平民，国都每迁徙一次，人们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就受到一次破坏，这也就是史书中所说的“民无定处”。

仲丁以后，商王朝的国势也几度中衰。王位纷争和屡次迁都，大大削弱了商王朝的政治力量，与商王朝敌对的方国则乘机向商及其属国进攻。从仲丁时起，商王朝与东方夷人的一支——兰夷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那些原来臣服于商的方国也纷纷摆脱商王朝的控制，停止向商纳贡，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写道：“诸侯不朝”。

所以，如何结束长时期的王位纷争，稳定商王朝的政治局势，巩固和扩大商王朝的政治统治，是盘庚必须着手解决的难题。终于，盘庚发现了解决这些难题的关键，迁都于殷。

迁殷，对于商王朝来说，具有多方面的有利因素。位于河南境内的殷都，近于洹河，有充足的水利资源可以利用。而且，这里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对于发展定居农业，提供了十分良好的条件。河南境内，最初是夏人居住的地方，自商汤在西亳定都以后，商人对这里的气候、地理条件已经完全适应。并且这一地区是当时中国的中心地区，商王朝对周围的方国有较深的影响，盘

庚以恢复“成汤之政”为号召，重返河洛平原。既得地利，又得人和。

更为重要的是，迁都于殷，对于商王朝混乱的政治局面是一个转机。自南庚迁奄以后，南庚家系在奄地盘根错节，形成了一股势力，这一势力的存在，使得南庚家系在任何时候都有篡夺王位的可能。把国都从奄地迁出来，南庚家系也就失去了与商王争衡的基础，其他贵族也将变得易于摆布。

但是，迁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贵族来说，迁都过程中，他们的家产要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他们不会赞同迁都。对于下层平民来说，迁都也将使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在短时间内受到影响，特别是以往的屡次迁移，使得人民都渴望着生活的安定。这样，盘庚在迁殷之始，就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尚书·盘庚》三篇完整地记述了盘庚迁殷的全过程。在迁殷过程中，专制王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盘庚将迁殷的打算公诸于众以后，引起了一些臣民的不满。于是，盘庚召集全体臣民进行训话，向他们解释道：我们不能在这里继续生活了。过去，由于上天把大祸降给我们，先王不能在自己的住所安定下来，只好四处迁徙。现在，我也是顺从你们的意向，迁到新的地方，使你们能够过上安定的生活，在那里建设我们的国家。

盘庚看到，真正的阻力来自贵族集团。自仲丁以来，贵族们日益腐化，盘剥人民，所以，他与下层平民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于是，盘庚严肃地指出：反对迁都的只是少数顽固分子，警告大家不要被浮言所迷惑，否则，就要被这些人利用。接着，盘庚又指斥那些乱政的大臣只知道聚敛财货珍宝，不能够体恤平民。从而，盘庚得到了广大平民的支持。

迁殷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盘庚率领全体商人渡过黄河，迁到殷地。在那里，安顿了人们的住处，修建了宫殿和宗庙，修筑了城墙，一座崭新的城市初具规模了。

为了打消人民的疑虑，盘庚又召集臣民发表演说。他说：“古时候，我们的先王成汤把人们迁到亳都，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起来。后来，由于水旱之灾，我们流离失所，没有固定的住处。你们曾经责问我为什么不惜使万民震动迁到这里，现在我告诉你们，就是要顺从上帝的旨意，恢复我们的高祖成汤的事业，把我们的国家从动乱中解救出来。”

那末，恢复成汤之政的关键在哪里呢？当时，给人民造成极大危害的，就是贪官污吏的残酷剥削，人民对于贵族的贪暴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针对这一点，盘庚宣布了自己的施政方针，他说：“我不任用那些贪财聚货的人，而要倚重那些为臣民着想，能够体恤人民，使人民能够生财致富、安居乐业的人，并要以此考察他们的政绩。”这个施政方针，其核心就是选贤任能，惩恶扬善，因功行赏。一方面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取得广大平民的支持，另一方面，打击不法贵族的势力，加强和巩固专制王权。

由于盘庚的施政方针切中时弊，所以得到了广大下层平民的支持，人们在新都的生活开始走上正轨。但是，那些在迁殷过程中受到沉重打击的贵族集团并没有因此而罢休，他们利用人们尚没有完全适应殷地生活的时机，在暗地里散布流言，在平民中间煽动不满情绪。贵族集团的不合作，使盘庚进一步意识到，遏止贵族势力的膨胀，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他把百官召集到朝廷，进行了严厉的训斥：

“从前，我的先王任用旧臣管理政事，大臣们都不敢说越轨

的话，现在你们编造出一些邪恶的话来蛊惑人心，我不知道你们的用意何在。我根据先王的法度办事，没有失德的地方，而你们却对下隐瞒我的政令。现在，你们所做的坏事已经败露，这正害了你们自己。你们有意见为什么不向我说，却用浮言蛊惑人心呢？从今后，你们要努力做好本职以内的事，不许乱说乱道，否则将受到惩罚，到那时，你们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对群臣不分远近，都一样看待，用刑罚惩治恶行，用爵禄表彰善事”。

盘庚的训话，在贵族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慑于专制王权的威严，贵族集团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盘庚迁殷，是专制王权对于部落贵族的胜利。在商代前期，文武百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部落贵族的性质。从商王朝建立开始，他们与专制王权之间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贵族集团往往利用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某些权利干预国家事务，这对奴隶制国家的发展是严重的障碍。这种阻碍作用在盘庚迁殷的过程中自然也会表现出来。盘庚迁殷的完成，在客观上打击了贵族势力，使专制王权得到了加强。当然，专制王权本身是残酷的，但对于发展中的商王朝又是必不可少的。

盘庚迁殷，扭转了商王朝动乱的政治局面。迁殷以后，盘庚开始致力于建立稳定的奴隶制秩序的工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盘庚以后，王位继承制度固定了下来。从《史记·殷本纪》以及甲骨文所记载的商代世系来看，盘庚以后的王位继承是按照一定的规定进行的，同一代的诸兄弟之间，王位是兄终弟及的，而下一代人中，则由幼弟的儿子继承王位。到武乙文丁以后，又进一步废除了兄终弟及的制度。王位继承制度的变化，是与盘庚迁殷紧密联系的，这在根本上清除了政治动乱的根源。从此，商王朝

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

迁殷以后，由于经济发展和政治局面的安定，商王朝的国力得到了恢复，与商王朝相邻的方国纷纷向商称臣、朝贡，在商王朝统治区域内，秩序井然。从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看到，盘庚死后不久，到武丁时，商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商人屡次兴兵攻打居住在西方和北方的 𠄎方、土方、鬼方等方国，这些方国都是与商及其属国相近的游牧部落，曾经多次侵扰商的属国和边境地区，对商王朝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经过几次战争，商王朝终于制服了这些方国，从而，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

盘庚迁殷，促进了商王朝经济文化的繁荣。从此，商人结束了流徙不定的生活，直到殷末二百七十三年之间没有徙都。从盘庚到商末的几代人之间，劳动人民创造了比商前期更为繁荣的青铜文化。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安阳殷墟的系统发掘，在那里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宫殿遗址，造型优美的青铜器。面对这丰富而珍贵的历史遗产，常常使人们想起殷都的奠基人——盘庚。



· 陈维礼 ·



暴虐之君

商纣王

商

纣王是商朝最末一个帝王，帝乙之子。子姓，名叫辛。号为帝辛。《尚书》亦称为受。纣、受古音相混淆。一说纣是暴虐无道的意思。后人根据《谥法》：“残义损善为纣”，又管他叫商王纣。

纣王有个哥哥叫微子启。据说是母亲做妾时所生，后来扶了正，又生下纣。商代后期尚未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纣以其才干继承王位，做了商王。

纣王力大无比，非同寻常。史书上说他能托梁换柱，倒拽九牛，徒手和猛兽搏斗。他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可见，他是一位具有聪明的头脑，强健的体魄，出类拔萃的人物，并非等闲之辈。以他独有的天赋，再加上微子启、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等贤臣的辅佐，是很可以大有作为，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同成汤、太甲、盘庚、武丁等明王一并载入史册。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聪明才智没能用到正地方。《史记·殷本纪》说他“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恃才傲物，自以为高出所有人之上，老子天下第一，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恣意妄为，干出许多令人发指的恶事。有才干而不走正道，又握有生杀大权的人，其对民众的危害也就愈烈。这就是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一面镜子。

商朝从汤武举兵，灭夏桀开国，到商纣王传了三十一世，历时六百余年。商人原来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境内有卫水、淇水、漳水等支流，土地肥沃，草木繁茂，又有丰富的水利资源，非常适于农作物的生长。在如此有利的地理条件下，商代后期的农业、畜牧业都很快的发展起来。当时的主要生产工具有